

2月电影累计票房已超96亿元,观影人次约2.3亿,但扶老携幼看同一场电影仍是难题——

中国电影,“合家欢刚需”仍未满足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2月即将翩跹时,中国电影市场又刷出了新的数据高峰。截至昨天,2月影市票房已过96亿元,在约2.3亿人次观众的支持下,票房同比增幅超过50%。但在刷出全球纪录的数字面前,在单月催生了三部20亿元级别影片的环境下,一个显而易见的“刚需”仍未得到满足——“过年期间许多人问过我,想带家里老人孩子一起看电影,哪部合适?”清华大学教授、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直言:“这个问题,我有些犯难。”

近些年,茁壮成长的中国电影被赋予不少新意义:文化消费刚需、新民俗等等,不一而足。但观众“看电影”这层要求被满足后,“看好电影”的需求随之而来。今年春节档里,一众影片虽在技术、胆识和想象力方面彰显了它们作为类型片的长足进步,但站在“合家欢”的角度看,仍留了遗憾:在中国人团圆情绪最浓的春节假期,许多人依旧无法在同一个影厅里实现阖家团圆。

真正的“合家欢”是能满足全家价值观念、审美习惯和智识需求的影片,而非简单“大手牵小手”

中国市场需要合家欢电影吗?答案毋庸置疑,观众的烦恼早已表明态度。人们对合家欢电影的渴求,追根溯源,来自生命的核心元素——亲情。一来,举家观影是桩带着些许仪式感的亲缘行为,每逢佳节此情尤甚;二来观影后若能形成家庭内部的互动空间,那么家人间温暖的讨论氛围定比手机聊天更为动人。

看看春节档诸片,《红海行动》热血沸腾,《唐人街探案2》机敏独具,《西游记女儿国》画面唯美,《祖宗十九代》包袱叠着包袱,观众总能各取所需。可一旦拿着“合家欢”的尺子衡量,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王兴东直言,那真实的残酷、成人化的笑料都不在“老少咸宜、妇孺皆喜、雅俗共赏”的圆周内。《捉妖记2》试图打全年龄牌,片方不仅拿“寻亲”当主题,还特意将第一部的3D改为续集的全2D版本。但新意贫乏、逻辑偏弱的故事,看得不少人观众哈欠连天,就连有些上了学的孩子也对看腻的萌物兴致索然。

善意地说,《捉妖记2》是部面向青年的影片向着全年龄段转型的失败尝试。追根溯源,很大原因就是误解了“合家欢”的真正意蕴。尹鸿说,真正的“合家欢”是能满足全家价值观念、审美习惯和智识需求的影片,它应当“能屈能伸”,既能让孩子抵达浅层的愉悦、领略全局的感动,也得给成人走深一步、想多一层留个入口。如果纯粹考虑“大手牵小手”,一味迁就孩子而降低种种标准,其量只能称“陪伴式观影”。《捉妖记2》是搞砸了的“合家欢”,反而《熊出没·变形记》在满足“陪伴观影”后做出改观,二者口碑悬殊,与各自定位不无关联。

过去几年,迪士尼的《疯狂动物城》、皮克斯的《寻梦环游记》、韦恩斯坦公司的《帕丁顿熊》等等,都是“合家欢”的理想注解。大银幕的呈现让孩子们记住了说话慢三拍的树懒、五彩斑斓的“爱波龙吉”、像英国绅士般生活的秘鲁小熊。而片中设置的美国社会阶层的焦虑、对家庭记忆的追索,以及当代美国人所面临的自我认同困惑等深刻议题,即便只是点到即止,亦提供给了成人“内观自省”“过分解读”的素材。

若一部影片能在家庭内部划出成人和孩子深入互动的空间,堪称一部春节档电影能达成的极好使命,却也是眼下中国电影最缺的功能。

这些电影让孩子入神,也让大人动心



►伊朗电影《小鞋子》返璞归真的父子情、兄妹情,超越国界,赢得好评。图为该片剧照。



“合家欢”难做,它既需要创作者甘与日常生活“促膝谈心”,也需要制片方能洞见质朴里的灵光

合家欢电影难做,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道新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观点,严格的“合家欢”应在各方面最大限度地熔铸一家人的各类诉求。但目前,当家庭各成员间本已存在观念的裂缝,要想在一部电影中调和一切,难上加难。

难题面前,该望而却步吗?“翻翻不算太久远的中国影史,答案显而易见。”王兴东建议,从前人的经验里寻找启示。他列出的片单,时间久远些的,有桑弧作品《魔术师的奇遇》,谢晋导演、于伶等人共同编剧的《大李小李和老李》,周民震编剧、谢添导演的《甜蜜的事业》,辛显令编剧、赵焕章导演的《喜盈门》;近一点的则有陆川执导的《我们诞生在中国》等。如果要从

这些跨越半个世纪的新老影片里找一条草蛇灰线,亲情是相似的切口,又何尝不是“捷径”。“家是人类社会机体中最小的细胞,但也维系了最牢固的情感脉络,以家庭为入口的电影,其本质是包罗万象的‘人的处境’。”无论是50多年前父子相逢不相识的喜剧故事,还是改革开放后聚焦生育或者婆媳关系的家庭伦理探讨,抑或动物世界的拟人化描摹,“生存与爱是这颗星球上亘古不变的主题,也当然能够网罗8岁到80岁的观众”。

但为何不知不觉,国产电影对于最贴近现实的朴素的爱,渐渐疏远了?王兴东从两个层面剖析,“合家欢难做,它既需要剧本创作者沉下心来,甘与朴素的生活促膝谈心,如此才能在日常中发现不平常、在平凡中挖掘非凡,写出人物间的戏剧张力;它也需要制片方能洞见质朴里的灵光,不因‘没有奇景奇情’‘没有大场面’‘没有逗趣画面’,就对剧本说不。”

别嫌小家难生波澜,更别误解不同

相关链接

■本报见习记者 王筱丽

所谓“合家欢”“全年龄段”电影,不是简单“拉低观影门槛了事”,那只会让孩子津津有味的同时,让成人昏昏欲睡。真正的“合家欢”,孩子能够看入神,大人也会动了心。

《疯狂动物城》:讲述兔子朱迪在动物世界中通过自己努力奋斗,成为动物警察的故事。孩子们得到一个“少女勇敢追梦”的故事,成人则透过瑰丽的画面,看到美国社会存在的偏见与焦虑。

《寻梦环游记》:“死亡不是别离,而是生的延续。”这是《寻梦环游记》的灵魂。而影片也以五彩斑斓的画面,消解了“亡灵”对于孩子影响,让他们能与长辈共同探讨家族的记忆、“生后的世界”。

《摔跤吧!爸爸》:乍一看,是个父亲将未竟梦想寄托在女儿身上的励志篇章。但在深沉父爱、家庭间互相扶持的大背景之上,创作者还注入了对印度真实社会情况的反思。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没了法术,也不会飞,不再火眼金睛也不再身如玄铁,齐天大圣孙悟空在这部电影里不再无所不能,却也因此显得格外生动。变身成为小和尚的唐僧拉近了与儿童观众的距离,大人们则在两人与路陪伴,找回初心的过程中感叹这股热血,感慨这份牵绊。

《小鞋子》:影片纯朴至极,九岁的阿里用尽所有力气在比赛中奔跑,只为得到季军的奖品——一双球鞋,这是他欠妹妹的一双鞋。孩子至善的品格和清澈的眼睛能够击穿任何年龄的屏障。而伊朗社会底层百姓的艰辛以及他们与命运所作的抗争,则是影片的厚重底色。

《魔术师的奇遇》:作为我国第一部彩色立体宽银幕影片,影片讲述了魔术师陆幻奇回到上海,寻找失散20多年的儿子阿毛和老友王小六的故事。这部从记忆深处走来的影片,至今仍透着阴差阳错制造的种种妙趣。而当年,它更是描摹了两代人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不同际遇,引人深思。

的生活背景会阻隔了观影人群,世界各国都有佳片已经或正在作出示范。阿米尔·汗大抵是中国观众最熟悉的印度电影人。连续两年,《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都在中国圈了粉。两则故事其实异曲同工,主角是普通人——父女或母女,关注普通话题——梦想的绽放,传达普遍的真理——执著与勇气,最后达到了普及的传播效果。至于故事的弦外之音,阿米尔·汗对印度社会的反思,则是影片在完成了人情、人性、人格叙事后的锦上添花。伊朗影片《小鞋子》《一次别离》《推销员》亦遵循着如是规律,它们朴实得没有丁点儿装饰,但恰是生而为人情感,轻轻拨动了各国观众的心;恰是见微知著的视角,让深刻的命题显出真实底色。

“电影始终是以真诚磨练的艺术。”王兴东说,“合家欢”的缺口对于行业也是一种评判——对生活的观察与体悟,考验编剧的匠心与原创力,考量制片方的良心与眼光。

日前去上海国际舞蹈中心观看上海芭蕾舞团演出的原创芭蕾舞剧《马可·波罗——最后的使命》,开演前,我问一个初中一年级的小朋友:“你知道马可·波罗是谁?”小朋友不假思索地随口回答:“一个意大利旅行家,到中国来过。”

这个回答让我有点意外。在西方,在欧洲,马可·波罗是一个妇孺皆知的人物,他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被称为“世界一大奇书”,是公认的经典地理著作,书中记叙了他1271年到1295年从欧洲到亚洲的旅行见闻,特别是他在中国的传奇经历,向欧洲人展示了一个富足、文明的东方世界,给欧洲知识界开辟了一个新天地,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向往。欧洲的航海家、探险家受他的影响,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到东方探险的浪潮。欧洲地理学家根据这本书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哥伦布阅读了《马可·波罗游记》,受到鼓舞和启示,激起了冒险远航的决心,带着西班牙国王致中国皇帝的书信,乘船远航,无意中到了中美洲,发现了“新大陆”。想不到一个中国十三岁的少年,对马可·波罗这个外国旅行家也了解不少。

仔细想想,也不奇怪。看看上海大街小巷星罗棋布的马可波罗(马可·波罗的另一种译法)面包店,即使你没读过关于马可·波罗的书,大概也吃过美味的马可波罗面包吧?看看市场上畅销的马可波罗瓷砖洁具,它早已走进了千家万户。高档时装店里马可波罗服装,更是时尚男女喜欢的品牌。一个700多年前的外国人,竟然如此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了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真是一个奇迹。

说奇不奇。马可·波罗其人,就是一个奇人。他生于意大利威尼斯富商之家,他的父亲和叔父经商旅游到达蒙古帝国夏都上都(位于今中国内蒙古多伦县西北),与忽必烈大汗建立了友谊,曾受命担任大汗的特使,访问罗马教皇。马可·波罗十七岁时,跟随父亲和叔父踏上东方之旅,沿着陆上丝绸之路,经两河流域、伊朗高原,跨越帕米尔高原,穿越大沙漠,途经中国新疆的喀什,再一路向东,经和田、罗布泊、哈密、敦煌,历时四年,抵达元朝京城上都,后随大汗到大都(今北京)。20多岁的马可学会了突厥语、蒙古语、汉语,深得大汗宠信,经常派他出巡,去过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苏州、扬州、杭州以及缅甸、交趾、印度等许多地方,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向大汗报告。

1289年,波斯王阿鲁浑的元妃去世,阿鲁浑派出三位男爵作为专使到元廷求婚,忽必烈选定姿色绝伦、才识过人的十七岁公主阔阔真应聘,同时派马可·波罗护驾,并承诺这是马可·波罗最后的使命,允许他及家人完成任务后返回故乡威尼斯。护送团有600多人,分乘14艘四桅帆船,从泉州港扬帆启航,走海上丝绸之路,驶过中国南部万里海疆,途经苏门答腊、爪哇、印度等地,历时两年零两个月,到达波斯(今伊朗)。马可·波罗完成使命,回到阔阔真26年的威尼斯。

1298年,两个意大利城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因商业利益发生战争,马可·波罗自己出钱装备了一艘战舰,并亲自担任舰长,与热那亚作战。威尼斯舰队全军覆没,马可·波罗不幸被俘,投入监狱。他在狱中把自己在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见闻讲给狱友作家鲁斯梯谦,作家把他的叙述记录下来,这便是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一年后,马可·波罗获释,重操旧业,经商谋生,同时结婚,生下三个女儿,七十岁时,因病去世。

马可·波罗作为一个商人、旅行家和探险家,在交通极为不便、列国战火不断的古代,历尽艰辛,披荆斩棘,跨越沙漠,横渡大海,播撒友谊,传播文化,为东西方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做出重大贡献,青史流芳。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700多年前,徒步或骑马、骑骆驼走通了陆上丝绸之路,又统帅舰队走通了海上丝绸之路,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他特别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到处有一种挖自矿山的黑色石头,可以点燃,火焰比木炭更大更旺,可以从夜晚燃烧到天明也不会熄灭,能发出巨大的热量。这就是煤。他把中国的用煤知识带回欧洲,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马可·波罗不愧为“一带一路”上一位伟大的先行者。

芭蕾舞剧《马可·波罗——最后的使命》,截取了马可·波罗传奇经历的中间一段,从三位男爵奉波斯国王之命,到元朝京城上都向忽必烈大汗求婚公主开始,忽必烈命马可·波罗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波斯。护驾舰队从泉州出发,海上风暴肆虐,海浪颠簸,船队在爪哇岛停靠休整,忠于职守的马可·波罗怀抱虚弱不堪的公主上岸歇息。在热带雨林的蛮荒之地,马可·波罗与野兽搏斗,保护公主。年轻英俊、勇敢智慧的马可·波罗和美貌善良的阔阔真公主之间的纯真爱情感油然而生。只是因为他们的特殊身份和使命,让他们把爱情的种子深深地埋在心底,只能在梦中互诉衷肠。

经过两年多的航行,马可·波罗一行历尽艰辛,抵达波斯,波斯王宫近在眼前,年轻的阔阔真公主突然感到无比的孤独、恐惧和哀伤;过往的路途虽然艰辛,但有马可·波罗——她梦中的情人时刻保护着她。现在马可将离她远去,返回故乡威尼斯,自己则有乡难回,她突然产生了随马可私奔的念头。迎亲卫队迎面而来,波斯王来到公主面前行礼迎娶,打破了公主的幻想。皇宫内鼓乐齐鸣,歌舞升平,在众人的欢声笑语中,只有马可和公主强颜欢笑,作最后的告别。一次伟大的航行,一路朝夕相伴的难忘经历,一个凄美哀婉的爱情故事,就这样缓缓地落下帷幕,让世人去品味思考。

幕间休息时,上海芭蕾舞团团长、著名芭蕾舞演员辛丽丽介绍说,成立于1979年的上海芭蕾舞团是国内一流的芭蕾舞团,不但经常在国内巡回演出,还曾赴日本、朝鲜、法国、加拿大、美国、印尼、新西兰、西班牙、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及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演出,受到国内外同行和观众的赞誉。

上海芭蕾舞团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魄力,与海内外艺术团体和艺术家建立了广泛的友好合作关系,《马可·波罗——最后的使命》就是由国际团队打造的一件艺术精品,编导是西班牙国家舞蹈大奖和洛桑芭蕾舞大赛第一名获得者约翰·马丁内兹,舞美和服装设计者是世界时装大师皮尔·卡丹,编剧是法国皮尔·卡丹公司的方方(法国)和张玮(加拿大),作曲是美国的丹尼尔·沃克,灯光设计是法国的马克·阿切让,马可·波罗和阔阔真公主分别由上海芭蕾舞团的优秀青年演员吴虎生和戚冰雪扮演。他们把马可·波罗的传奇经历和两人出生入死的青春爱情故事演绎得细致入微,淋漓尽致,催人泪下。

剧场里灯光亮起来,演员们走到台前谢幕,观众席上响起一阵掌声。我突然看见前排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抱着妈妈哭起来。妈妈问她:“你哭什么?”女孩抽泣着说:“他们要分开了。”马可·波罗的故事,不但激励过、启迪过古代的欧洲人,而且激励着、感动着当今的中国人。当我们乘坐高铁、飞机、轮船,航行在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跨越大洋,飞越沙漠,都会想起马可·波罗,想起阔阔真公主……



上海芭蕾舞团演员吴虎生和戚冰雪分别扮演马可·波罗和阔阔真公主。(上海芭蕾舞团供图)

『一带一路』上伟大的先行者

贾树枚